

社会科学

第一卷 第二三期合刊

一九四五年

社會科學

第一卷 第二三期合刊

SOCIAL SCIENCES

Vol. 1 No 3 & 3

Published by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Fukien Academy

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編行

福建永安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

社會科學第二・三期合刊目錄

一般理論研究

混合經濟制度論批判	王亞南
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	周憲文
全體主義經濟理論總清算	涂西疇
「感覺分析」的再分析	守義
戰時社會經濟本質所體示的復員措施	余志宏
現代會計學的本質及其研究對象	張來儀

中國問題研究

論今後我國貨幣的穩定與幣制的確立問題	倪思文
論中國土地問題解決的諸指導原則	蔡世元
論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政策	解樹民
評早川二郎的中國古代社會論	胡璠樸
太平天國時代團練抗官問題引論	傅衣凌
太平天國革命的國際關係	周國鈞譯

福建問題研究

我們怎樣調查閩西的土地改革區	章振乾
泛論福建省地方經濟建設	侯剛
宋代之福建對外貿易	胡寄聲
清代台灣的墾治	周國鈞

專 載

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工作新計劃綱要
閩西土地改革實況調查綱要（本所農村經濟調查計劃之一）

混合經濟制度論批判

王亞南

一、論題的提出

「混合經濟制度」(註一)在今日尚不是一個很習見的名辭。它是在此次大戰將趨結束時，由中外若干皮相經濟論者所津津樂道的。也如一切其他初見的名辭一樣，它的涵義，並未十分定著，而正有待於一切對它發生興趣的研究者觀察者去貌為比附。但目前像上述那些人士之提論到它，顯然是基於以次的，却並不會經由科學證驗的事實。即他們認定在此次世界大戰歷程中，世界兩個對立的經濟體系，即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與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都在發生變化，並且將都在戰後發生更大的變化，那變化的顯明傾向，就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看的蘇聯社會經濟，在戰時已有不少向右轉的資本主義化的徵候，而作為那種徵候之徵候來看的事實，就是蘇聯採取了允許宗教信仰自由、提倡愛國主義、解散第三國際組織，以及以較多報酬誘致較大勞動生產效率的許多步驟；同時在資本主義的英美諸國，則又因戰爭的迫切需要，依統制干涉的程序強制的採行了一些在經濟方面的社會化與國有化的步驟。像這樣，一方面向右資本主義化，一方面向左社會主義化的正相對照的措施，就給予了留心世界經濟演變的人士以一種頗不平凡的印像，使他們像很有根據和理由的，斷定今後世界經濟將走向折衷的混合的路，依我們傳統的表現方式，即是走向所謂「中庸」的路。慣於傳播這類皮相見解的國內權威的大公報，就會在其去年上期（記不清月日）的桂林版上，強調這種趨勢。而根據近一年來的報導，英國似更具體的在計劃與提議擴大鑛業交通業諸方面的國有化的程序，美國亦不絕有類似的措施，如最近田政府宣佈若干鑛產資源地的國有等，即可見一般。此外為法國將淪陷區維歐人轉變過所有權的各種大企業，分別由政府

予以管制和沒收，亦不外此種趨勢之具體反映。單從這諸般事實來講，我們原不妨有條件的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左傾社會化的傾向的存在；但在另方面，關於蘇聯戰時國內社會經濟的真正動態，我們如僅憑上述的一些需要充分鑑別之措施，而斷定蘇聯在戰後不但不會進一步社會主義化，且會改變其根本作風，而趨於資本主義化，那想法，就誠如一位美國記者所說，是一種不可救藥的「愚蠢」。因此，從這一個視野來預斷戰後世界經濟會走向混合制度的可能，就顯然是「不可必而據之」的奇想了。

可是，混合制度論者們並不會因此氣餒。他們有的甚且更進一步，以為整個世界經濟，即使不全是分途傾向於折衷的混合，但它們各別國內在分別進行中的不純粹的資本主義制或未完全否定資本作用的社會主義制度，那已表明混合經濟制度，並不只當作一個傾向而存在，且還當作一個事實而存在，對於客觀的事實或客觀的可能傾向，人們是有依照他們自己的希望或想像，去編造一種為他們所樂意的字彙的自由。但混合經濟論者，却至少需要在理論上克服以次這幾種可能引起的混亂：

（一）承認混合經濟制度或其可能，首先必定已承認了作為混合因素的諸種體制，如資本主義體制社會主義體制等等的嚴格性；而承認了這種混合制度或其可能，又無異在否認那諸種體制的嚴格性。

（二）社會的發展，貫徹有作用於其中的一定歷史法則。各種經濟制度，都有它自己的法則；每種經濟制度在向着其次一經濟制度推移的歷程中，又都分別表現有不同的法則。混合經濟制度是不是亦有它的法則，或者亦有其混同各種經濟制度法則所形成的混成法則，如其是的，那就不但是對於各別歷史的經濟制度的法則的否定，亦是對於它們之間的連續推移的法則的否定。

（三）混合經濟制度不僅如上面所述，會否定社會經濟法則，同時還必然會由其推論而否定歷史，或至少不能不在其理論邏輯上，承認歷史到此終止了。

如其混合經濟制度論者無法解除這諸般理論上的混亂，他們就必然不可避免的會在實踐上引起一些舉棋不定的昏迷與周章。因為一切經濟的措施，都必須是依據客觀現實所顯示的變動傾向或法則，有目的的予以因勢利導或合理規制的结果。如其我們惑於一個社會同時並存着的諸種經濟體制的因素，而不理解何者是它的基本經濟體制的構成分，不理解那種體制已演變至何階段，並將為何種其他較進步的基本社會經濟體制所代替，則所謂「有目的的利導」與「合理的規制」均將失所依據。因此混合經濟制度這個名稱的提出，如其不是號召者為現實的表象所迷惑，就是他們想用這種號召，去迷惑人們。在世界整個經濟的大轉形中，特別在中國經濟的改建過程中，我們需要對這一似是而非的謬見，予以明確的辨正。

二、當作「混合經濟」之先行體制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 與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形態

一提到混合經濟體制，人們很容易聯想到為大家所熟悉的，但却會被應用得非常混淆的兩個語辭，其一是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制，其一則是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制。這兩個語辭，儘管在今日已明確的在分別表現着兩個性質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而一般人對它們的理解，却仍是非常混同。我們當前的混合經濟制度論者，也許還有興趣把它們用來支持其論點。因為在這任何一種體制之下，都同時存在着資本主義經濟因素與社會主義經濟因素。

蘇聯在推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列寧曾在社會鬥爭的戰路上提出「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稱（註二），揆其用意，無非是在當時生產極度破壞與極度萎縮的情形下，想藉着對私人資本作種種讓步的措施，使一般國民產業有一昭蘇的機會。但當上述目的在開始第一次五年計劃期內，得到某種限度的實現時，本來由國家給私人資本以發展機會的政策，就變質為發展國家資本的政策。於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稱，便隨着政策的改變，被代換以「國家社會主義」的稱呼（註三）。此後「國家社會主義經濟」云云，遂專門用以表識蘇聯迄今所施行的經濟形態。在這種經濟形態裏面，仍含有不少的私經濟成份。所以蘇聯社會經濟的右傾推測是由此出發；如從蘇聯方面看出混合經濟的何等展望，亦似只能由此出發。

在另一方面，當蘇聯依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五年計劃建設所謂「一國社會主義」的期間，我們又還發現另一個昌言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即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希特勒德國的「精神抄襲」，當然不止於「國家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它也還有作了「五分之一折扣」的第一次第二次四年計劃。但在計劃剛開始實行以前不久，在所謂二十五條黨綱中，凡可以比附於「國家社會主義」的諸條目都被「領袖」一筆勾銷在「不許亂談主義」，「不許作理論試驗」的腳註中。結局，由酒窖革命起義到柏林地下室消亡去的希特勒德國，就一直是為大資本所支持，因而一直是在支持着大資本。在備戰及從事戰爭的過程中，領袖希特勒及其黨徒，無疑也推行了不少「難盡如資本家意」的經濟措施，不少有關軍需的大企業，按照戰爭及維護統治的便利與要求，分別予以合併或重新編配了。即國家對於大資本的所有權雖然「誓忠」保障，並且被宣揚為「國家化身」的領袖希特勒，雖然在扮演着「資本十字軍」領導者的大角色，但一切資本的使用權，却無疑被侵奪了。觀的也許就因此之故，希特勒德國的經濟的劇烈社會化措施，亦遂被設想為或被認定具有可社會主義因素。而這種「僭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實是依大資本對國家行使壟斷統治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就可能被視為所謂混合經濟之又一前身。

顯然的，德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從典型的資本主義觀點去看，那是頗不純粹的，正如同蘇聯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從理想的社會主義觀點去看，亦是相當不純粹的一樣。但「不純粹」云云，並不能不加辨別的理解為「混合」。對於蘇聯型經濟，我們只能說它尚殘留有資本主義的因素；對於第三帝國型經濟，我們亦只說它表現了若干社會化傾向，它們分別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為其立國精神和基本社會經濟指導原則的事實，却並不會因為它有那種殘餘或有那若干傾向，而在認識上引起混同的錯覺。

然而，混合經濟制度論者，是可能由這類錯覺出發的。因此，我們對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及國家社會主義經濟，不能不有進一步的說明。我曾這樣理解過（註四）：國家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轉形形態，而國家社會主義，則是社會主義的初期的或未成熟的形態。它們不僅在發展歷程上是「鄰居」，並且前者可視為是對於後者的技術準備階段。雖然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可因其社會的或歷史的條件的差異，對於由其轉形形態過渡到未成熟的社會主義形態的必然順序，在規模上，在延續期間上，在表現姿態上不一定相同，但以次兩點是非常明白的，即

（一）已發展到轉形階段的資本主義，決不會再回復到它典型的形態；同時，已發展到未成熟階段的社會主義，更決不會逆行或倒退到任何資本主義形態。因為其中存在着這樣的事實：

（二）資本主義即使是在轉形階段，當作這個階段的社會經濟的指導原則或指導精神，仍不能不是資本主義的；同時，社會主義即使是在未成熟的階段，當作這個階段的社會經濟的指導原則或精神，也仍不能不是社會主義的。

我們能把握這種關鍵，就有理由根本否定所謂混合經濟制度的「說教」。但其概結，還須得作進一步的深入的說明。

三、對於社會經濟制度多重存在的差別理解及其在實踐上的一元指導

如其說，作為歷史發展階段看的若干社會經濟體制，同時並存於某一特定社會，便被理解為混合經濟制度，那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像這樣一種制度，即使是今人所「發明」，但卻並非始自今日。大約自原始共同社會崩潰以後，在一切歷史時代或社會階段，差不多都多少存在着其前一發展階段的經濟制度的遺留。我們甚且可以說，純粹的單一的社會經濟制度，即不混合着其前一發展階段的殘餘和後一發展階段的萌芽的經濟制度，客觀上是根本不會存在過的。舉一個較極端的例吧，列甯在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曾言當時蘇聯經濟裏面，包含有由原始村落共同體到社會主義這一序列的五種不同的經濟因素。這應該說是集混合制度之大成了。然而我們在認識蘇維埃經濟的時候，却並不把它看作混合經濟制度，而竟不顧它的那種「無所不包性」，僅認定它是與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對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態。不論是贊成它的人，抑且是反對它的人，都一致當作明白的事實這樣承認它，正如同我們今日，還可毫不遲疑的承認英美型經濟為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一樣。我們其所以對於相並存在着的各種社會經濟因素的某一社會，只確認其中之一的某種經濟形態作為其代表經濟形態，那首先最直接的無疑是要看那各種社會制度的經濟因素，究竟是由何者在客觀現實上佔着最大的或較大的數量或比重。然而，這儘管是最普通的看法，却並不是最能避免錯誤的看法。要澈底了解一個社會的代表經濟形態，除了注意其規模或數量外，同時還得就以下三方面去確定其性質，其中之一方面，是要看該社會所由構成的諸基本經濟條件，在體現着怎樣的社會本質；另一方面，是要看該社會的諸基本生產關係，形成了如何的社會階級構成；最後第三方面，是要看該社會的一般經濟活動，在被怎樣的指導原則所左右。

這裏且先就不十分可靠的數量觀察說起。這所謂數量觀察，是看在某一特定社會中，某種性質的經濟因素，對其他經濟因素佔有如何的較大的比重。但這種觀察方法，很容易把我們導向下面這種疑團：比方說，蘇聯的實施新經濟政策當時的經濟，資本主義性的經濟成份，特別是在農村方面的富農經濟成份，無疑對社會主義性經濟成份，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比重（註五）。也許因為是單看到這一點，當時資本主義各國的大資產者階級，正確信這個「一度了着了社會主義之魔」的國家，快要清醒過來，重復回到它們的懷抱。就在同情蘇聯的國際人士，亦有不少在就心蘇聯對國內資本主義勢力讓步太過、縱容太過，是不是會釀成資本主義「復辟」的危機。

然而，在蘇聯自身，它却自信有一些極可靠的保證，就是，依着正確的社會科學理論，它知道決定一個社會的性質的經濟因素，是它的基本的生產工具。在土地在國有，一切其他工礦交通諸方面的生產手段，通通把握在國家手中的情形下，為了刺激生產，活潑國內市場，讓一般農民及工商業者，在一定限度下展開自己的謀利活動，那不致發生怎樣了不起的反社會主義危機。

無疑的，商工業者農業者，積得了相當財富，變成了中小資產者，變成了富農，勢將不免比照其財富力量，在社會生產關係上，在社會階級構成上，引起一些變動，事實上，在新經濟政策將要結束的當時，這種變動確已成為蘇聯當局的注意焦點，但正因爲前述社會基本生產手段把握

在國家手中，從而，國家的政權把握在無產者大眾手中，以往資產階級所依以存立的一切社會特權、社會便利、社會基礎，通通不存在了。所以，富農及中小資產者一時雖像來勢汹汹，但因為他們擴大其社會權力的基本條件，早被把握在與他們站在對立地位的階級手中了，等到反富農，反資本主義活動的新措施一開始，他們馬上就在幾次五年計劃中，完全被清算了。

因此，在最後，我們知道，要測驗一個社會是由那種制度的經濟成份佔着表識它或代表它的地位，與其從靜態上去計較它已成就的數量或規模，甯不如從動態上，從實踐活動上，去規知它的指導原理。因為，在我們的研究立場上看來，對於一個社會制度的性質的決定，與其就是在它已有的經濟的成就，不如說是在它正在發展中的動態。而引導或指點那種動態的實踐方針，不但反映着那種社會的生產關係或階級關係，還反映着那種社會的基本生產手段，是把握在誰的手中。

可是，上面的說明，如應用到蘇聯以外的任一國家，却又需要我們對基本社會科學理論，作更靈活更有差別的運用。比如就典型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來說罷。它在今日，沒有一個人懷疑它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但它的資本主義，却顯然已脫離典型階段，而移到了轉形階段。惟其他在這一階段，它的政治經濟動態，就表現了一些令人感到迷糊的外觀。今日最有力指導或左右英國社會經濟活動的兩大政黨，一個是保守黨，它的政綱極鮮明的在擁護既成的資本主義勢力；另一個是工黨，它的政綱，雖不像前者那樣鮮明，但最後却要求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照我們上面關於蘇聯政權性質及其經濟指導精神的理解，英國政權掌在保守黨手中，其經濟指導方針，無疑是在向着維繫既成資本勢力方面努力，我們由此很容易看出英國的資本主義性格。但如像目前這樣，英國是由保守黨的反對黨工黨執政了，工黨如「認真」實行其社會主義化的綱領，我們是否可以據此推斷英國為社會主義國家呢？我們如對此沒有一個明確的解答，勢將影響我們上面的整個立論點，而為所謂「混合經濟制度」開一方便之門。

但我們知道，英國社會的一切基本生產手段，通通是由大大小小的資本家所把持，照應着這種事實，英國的統治階級，還是資產者階級。在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毫沒有動彈的情形下，工黨所提出的社會經濟綱領，至多只能是改良主義的綱領，它只企圖把社會主義作為未來的展望，而不想立即以激烈的手段求其實現。惟其如此，工黨就可能在資產者統治的政治經濟基礎上，掌握政權，亦正惟其如此，我們就無法由當前掌握英國政權的工黨的可能作風，而把英國社會理解為社會主義社會。

不但如此，我們在另一方面還有理由相信，在客觀現實的要求下，在「以退為進」的政略運用下，在「廉價」革新步驟可能更有利於「寶貴」社會權力保留的權衡計算下，保守黨在某些場合，不但會贊同工黨的「廉價」革新，甚且還樂於提出它的「社會主義」。前此保守黨內閣的建設大臣伍爾頓勳爵，就曾提出一個「向貧困宣戰」的計劃，這計劃是曾被譽稱為「我們的時代的社會主義」（註六）。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上建立的，亦可能是由資本主義被迫逐漸讓步，逐漸採取革新步驟，而逐漸接近於實現之旅程的。但基本的社會經濟組織沒有受到威脅，「突變的生育陣痛」不會經歷，那依舊還是資本家的天下。

把蘇聯同英國的社會經濟本質，從一切亂人視聽的表象上，明確認出來了。我們就知道所謂混合經濟制度，只不過是在那些辨認不清各種社會經濟本質的人們的頭腦中存在，或者只是在那些希望複雜的社會經濟事象，變得適合於其簡單想法的人們的頭腦中存在。因此，我猜想這種在現實上根本不會存在的混合經濟制度，將在中國論壇上，當作一個「時髦」而流布傳揚着，形

成爲轉形過程中的現實革新認識上的一大障礙。

四、中國經濟改建上的「三重混合」問題與「二重混合」問題

被當作世界的一個重要構成份來看的中國，無論我們願不願意，它已經是處在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推移的世界大轉形的過渡階段了。但在中國自身，又無論我們承不承認，它確還未從前一個轉形階段，即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推移的轉形過渡階段，蛻脫出來。

照應着並正視着這種歷史現實，孫中山先生在將近三十年前，就提出了順及世界潮流及中國自身社會條件的民生主義經濟改建原理。雖然快經歷一個世代了，那種原理的正確性，還不曾絲毫受到懷疑。所可惜的，是我們迄今還不曾將它付諸實行。這一次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應是我們認真實施民生主義的時候了。時賢對於如何實施，以及在實施當中需要注意到的問題，論列頗多。但從字里行間，使我體認到他們大多數的見解，有意無意的混雜有這里所論及的「混合經濟制度」的意識，比如，顯而易見的：

(一)在論及中國工業化的時候，大家不約而同在把論點集中到工業化的諸技術條件方面，彷彿落後的封建諸生產關係以及依存或「符合」於那些生產關係的變態的商業金融形態，對於工業化都無妨礙；又彷彿工業化中的民營國營的措施，不妨與那些關係及那些經濟形態相並存在「各適其生」一樣。

(二)在把民營事業理解爲資本主義型經濟，國營事業理解爲社會主義型經濟的場合，大家又不約而同的以爲這兩者同時推行起來，會水乳交融的達到調和而折衷的圓滿結果。「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包容哲學，更大有助於這種意識的發展。

對於前者，我稱之爲「三重混合經濟制度論」，即有意無意的認爲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可以混爲一體，中國土地幅員之大，國內經濟發展之不平衡，頗足爲他們「持之有故」的論據。不錯，他們中間較高明一點的，有時雖也認定有剷除封建勢力的必要，但當他們高興起來，却又以爲工業化的過程，同時就是各種封建傳統解體的過程，但他們不知道這僅是問題的一面，其最關重要的另一面，却是各種封建傳統正在阻止工業化，歪曲工業化。

對於後者，我們稱之爲「二重混合經濟制度論者」，他們已經認定要工業化，必須從土地改革的程序上，從根掘去各種封建力量生根的地盤。可是他們沒有注意到，土地即使改革了，社會型與資本型的經濟，在某種場合，儘管像是可以相互補充，相互促進。但它們彼此間相對相消的作用，却大過封建制與資本制間的矛盾。所以我們如其天真無邪地認定它們在客觀現實的演變上，也可以像在我們高論者頭腦中那樣糊里糊塗的不分界域，那我們一開始各種企業私營國營的程序時，立即就會碰上許多步驟凌亂與互相牽制的弊害。

總之，「混合經濟制度」在理論上是不存在的，任何社會在任何一個階段，只允許有一個支配的指導的力量。而且只有在單一的指導原則下，才可能使社會經濟的發展，較順利地達到預期的目的。以當前中國客觀現實的情形看來，非特殊的頑固者，決不會再堅持要保留封建力量，並以爲保持封建力量，可能不妨害工業化。他們至多只不過小視了傳統封建諸勢力，並且對那種勢力所依存的社會根基還有些隔膜。這就是說，從所謂「三重混合經濟制度」錯覺解放，還比較容易；但以同一的當前客觀現實看來，要大家從所謂「二重混合經濟制度」錯覺解放，就比較困難了。因爲我們已經有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封建毒害的經驗，而對於資本制度如何妨礙社會化的教訓，則只是漠然得自其他國家。因此我們如其不願意爽爽快快的走資本主義的路，或者渴切希

望避免資本制在各國所造成的弊害，則我們在並行國營與私營的建設程序當中，就要明瞭我們的建設指導原則，必須偏重在那一方面，它不能是混同的，不能是二重的。二重的經濟指導，在經濟實踐上所發生的破壞影響，恐怕比二重的軍事指揮，在軍事行動上所造成的混亂，還要嚴重得多。然而，建立軍事的統一指揮，是較之建立經濟的最高指導原則，要容易得多的。因為經濟上的單一的指導原理或指導精神，必須是—定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這，我們試回顧本文前面第三節所說即可明白。其中有許多實踐上的道理，需要詳加分釋，容易作專文討論。這里，只不過乘着尙論一般混合經濟制度的機會，順便述及罷了。

〔註一〕據夏炎德君在其「戰後世界經濟之歸趨」一文（見經濟彙報第二卷第九期）所述，混合經濟制度，係由美人史泰來（Staley）和蔡思（S.Chase）所強調，其在中國，在形式上，也許夏君是首先表示贊同者。

〔註二〕見拙譯乃特等著歐洲經濟史第七七二頁。

〔註三〕見拙譯乃特等著歐洲經濟史第七七二頁。

〔註四〕我曾有一篇「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與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長文，送交中山文化季刊，但桂林淪陷，使它發刊成了問題。

〔註五〕「在一九二三年終，中央統計局估計，私人貿易佔國內貿易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同年，國家獨占大工業的政策，亦弛緩下來，私人租借財產，私人特許及混合公司的經營，是三種一般的例外」「僱工人數在二十以下的私人工業被允許了，農民在其保有地上」，「可僱全年長工，並以金付工資」——參見前拙揭舊歐洲經濟史第七六八頁以下

〔註六〕見李譯英國的改良政策（國際時事研究第一期）

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

周憲文

一、問題的解釋

在「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這一題目之下，可有兩種說法，最普通的一種，是指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的關係而言。申而言之，那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發展以後，何以會產生社會革命？為要解答這一問題，必須由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着手。由分析而指出资本主義生產制度的內在矛盾；並由此內在矛盾而說明社會革命的必然性。這種說法，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通的。但不是本文的目的，其次，是在上一說法的前提之下，說明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的關係。明白些說，還有兩門問題。

第一：社會革命的產生，既然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那末，社會革命的實現，應當「先」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而事實呢？例如英國，他是資本主義的「老本家」，直到今天，還沒有社會革命。再像美國，他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後起之秀」，直到今天，也沒有社會革命。而已經社會革命了的，反是不論在「時間」上，或在「規模」上，都不及英美這樣資本主義化的帝俄。又在今天，受到社會革命的威脅，比較嚴重的也還不是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這是什麼道理？這一「道理」，是否與上述「社會革命的產生，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這一原則相衝突？尤其重要的，是由「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的觀點看來，這一現象，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比方說，有些學者，他們強調當年帝俄的政治以及社會的環境，認為這些就有帝俄所以產生社會革命的原因，這在說明帝俄社會革命的原因上，固然是有理由的，但在「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的理解上，還是「不够」的。對於這一「不够」的補充，這是本文的問題之一；而這一

問題的解釋，對於「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的理解，在我以為，又是絕對必要的。

第二：更進一步，社會革命的產生，既然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那末，社會革命的實現，縱使不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亦當不在資本主義未發達的國家。這一問題，換句話說，就是由「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的觀點來說，資本主義未發達的國家，到底有沒有社會革命的可能性，到底可不可以講社會革命？關於這一問題，直到現在，還祇有「理論」的爭執，而未有「事實」的證明。如果要講比方，那就比方說是印度，直到現在，還未完成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故像這樣的國家，到底有沒有社會革命的可能？到底可不可以講社會革命？如果「有可能」或「可以講」的話，那是否與上述「社會革命的產生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這一原則相衝突？記得日本經濟學者河上肇先生著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大體就傾於「否定」的方面。假使這一「否定」果為其理，則任何國家，要社會革命，一定先得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其然豈其然乎？我想由「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的觀點，加以探討。這就是本文所欲說明的次一問題。

二、必然的事實

先說第一問題。那就是社會革命為什麼不產生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而反產生在在資本主義欠發達的國家？這由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的觀點說來，我及認是「必然的事實」，而非「偶然的現象」。那因為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固然有衆多的革命幹部，但亦因其資本主義的發達，他有高度的生產能力，並廣大的商品市場；他在這些方面所得的利益，就可用以和緩社會革命的產生。至於次一等的資本主義國家，情形大不相同，尚就因為他們既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所以已經種下了社會革命的種子，而同時又為「次一等的」，所以不論在生產能力與商品市場上，不但都無特殊的利益，而且相反要受「高一等的」國家的壓迫，為欲抵抗這些壓迫，又得加強對於國內民衆的搾取。而其結果，就比「高一等的」國家，增加了社會革命的可能性。唯其如此，我的偏見，認為社會革命是資本主義的結果，但社會革命的最初產生，反是一定在那資本主義不甚發達的國家。至於一般所謂政治以及社會的條件，那祇是一些「次要」的原因，那祇有「導火」的作用。這就是說，社會革命最初產生於資本主義較不發達的國家，那就「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的觀點來說，是必然的。至許多資本主義較不發達的國家中間，何以社會革命產生在甲國，而不產生在乙國，那才由於所謂「政治與社會」的各種原因。要說比方，假定現有十個團體，其中三個是剝削人的，其餘七個是被入剝削的。而這剝削人的三個，一方面固然是向其餘的七個剝削，而同時每一團體的上層份子又是向其團員剝削的。尤其是到了對外的剝削，達到了相當的程度而難於繼續的時候，勢必轉而加緊對內的剝削。固然，任何團體，對內的剝削愈甚，則其團員對於上層份子的反抗自必愈烈，不過，其中有一團體，因為力量大過其他兩個團體，故在對外的剝削上，前者自亦「勝過」後者。前者的上層份子，以其「勝過」的全部或一部，用在改善團員的生活上，那就必然相對的和緩了團員的反抗，也就和緩了社會革命的產生。而亦必於這種「勝過」的關係，就其壓迫團員的力量來說，也是足以延遲社會革命的產生的。至於其他兩個「較差」的團體，則情形「適得其反」，而此「適得其反」的諸般情形，原有使其儘先爆發社會革命的必然性，再加上一些「外感」，如政治或社會的原因，那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所以，社會革命雖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產物，但社會革命的產生，反先見於資本主義生產制度較不發達的國家，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完全由於「外感」的，這是由於「資本主義與社會革

命」的「必然的事實。」

三、可能的趨勢

再說第二問題。那就是社會革命既為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的產物，雖是「必然」最初產生於資本主義較不發達的國家，至於資本主義並不發達，或根本沒有資本主義影子的國家，應當是不能產生社會革命的。但我則又認為這是「可能的趨勢」。其故焉在？

這一原因，就在世界是整個的。蓋如前述，所謂社會革命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的產物，這祇是一個最高的原則，根據這一原則，世界上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那就一定不會有社會革命的，而亦不需要社會革命的。但是一旦，世界上有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而且發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則亦因為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發達，把世界形成一體，所以，有些國家，就其本身而論，雖然還沒有資本主義化，但就世界而言，則也不脫資本主義的支配。亦因如此，就其本身而論，固然說不到社會革命，如就世界而言，則有時不但「需要」，而且「可能」產生社會革命的。

先說需要。由農業社會走上工業社會，既然是經濟發展的一條鐵則（至其理由，則非本文所及論），而所謂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尚未形成的國家，換句話說，那就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業生產本來不是一件壞事，可是到了工業生產已經抬頭以後，這顯然成了一個落後的生產方式。依賴這種生產方式而存在的國家，顯然是落後的國家，這拿新名詞來說，就是先進工業國家的殖民地。縱使其政治的形式還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至其經濟的意義，則無論如何總是先進工業國家的一個附庸。在這時候，一個國家，要在政治上，特別是在經濟上，求得解放，如果另有辦法，自當別論，不然的話，那就需要社會革命。理由就在這一國家，要是也像其他國家一樣，先求資本主義的發達，再求社會革命的推動，這一般情形而言，不但是多餘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試以印度為例，目前的印度，是否需要社會革命，那是另一問題，假定說是需要的，惟其時期，要待印度的工業生產發達到了像英國這樣的程度以後，這就等於說，印度永遠沒有社會革命的可能。此所謂「永遠沒有可能」，那就是說，即使世界任何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已社會革命，印度也是不能社會革命的。這就因為像印度這樣經濟落後的國家，即使不說不可能資本主義化，但一定不可能趕上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水準。惟其如此，所以像印度這樣的國家，雖然距離資本主義的生產還是很遠，但也不是絕對沒有社會革命的需要的。

再說可能。需要是一事，可能又是一事。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國家，即使需要社會革命，至於是否可能，那就要看週遭的條件。這可分為「本身的」與「外來的」兩方面。關於本身的條件，本文不擬舉述。關於外來的條件，本文亦祇舉述一點，那就是一定要有社會革命先進國家的支持。這就是說，一個尚未資本主義化的國家，可能社會革命，但其產生，則必在世界上已有社會革命先進國家的存在。質而言之，如果沒有社會革命先進國家的支持，則在資本主義的勢力籠罩之下，他是無法可以翻身的。

四、總括的結論

總而言之，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這一問題。

- 第一：資本主義是社會革命的前提，沒有資本主義就不會有社會革命的。
- 第二：但是首先社會革命的，在我的理解上，不是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乃是資本主義次

發達的國家。這些國家，加上一些旁的因素，乃就首先在世界上促成了社會革命。

第三：就資本主義與社會革命的關係來說，祇要資本主義已經發達到了相當程度，而且在世界的一角，已有社會革命的成果存在，那末，一些尚未資本主義化的國家，不但是有社會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其可能的。當然，如果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除了社會革命以外，還有別的更好的方法，可以翻身的話，那是另一問題。

本文的主旨，就以上述第一點為根據，而在理論上，說明了上述第二第三兩點，亦即根據所謂「社會革命是資本主義的產物」，這一前題，在理論上，說明了本文開頭所提的兩個問題。

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於永安

全主養聖賢書

四 糸

西縣縣史沿革會館碑

爲脫出這種厄運，向外索取殖民地和掠奪資源，便成爲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向前發展的唯一途徑。可是當德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尾巴的「跛腳兒」，在前世紀九十年代踏上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的旅程時，全世界「自由的非領土」在地球上早已被幾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分割光了，這在德國的金融資產階級自然是一大苦悶。爲着衝破這種苦悶的境遇，就必須採取「武裝突破」的「錐形戰術」。這個「錐形戰術」的總執行主帥，便是德意志帝國卓越的前哨——威廉第二，他一脚踢開德意志帝國建立者的畢斯馬克，展開瘋狂的擴軍運動，就是「武裝突破」戰術執行的發軔。但軍需工業的擴展，是要以全國生產機構更緊密聯結，更組織化爲前提；否則，這一部門的畸形發展是不可能的。因此，「產業合理化」避免內部的自由競爭，便成爲當時德國金融資產階級轉向海外發展，衝破封鎖線的共同要求了。這種要求，由威廉第二以「合現化」的運動忠實的執行了，它的推動主軸機構，便是以德國金融資產階級應結合的六大銀行。推行的方式是以政治的強制力，通過這些金融機構，迫令各企業單位聯合同盟，所以在本世紀初，德國的卡特爾（Cartel）企業組合，便像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了。據列寧帝國主義論中所引的統計，德國卡特爾底數目，在一八九六年約計二五〇個，在一九〇五年約計三八五個，參加的企業，大約有一二、〇〇〇個，從這個數字的引證，我們已不難看出德國一走上金融資本主義階段，企業壟斷是如何的猛烈發展着。在一九〇〇年，德國的銅鐵產量即已超過英國一千四百萬噸的紀錄，其他各工業部門的產量，亦飛躍的發展着，也無怪老大的英帝國聽到「德國將來在海上」的德皇宣言而慌張了。

像德國這樣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短短的時期內，一躍而成爲資本主義頭把交椅的英帝國的唯一勁敵，一方面固然證明了資本主義資本集中運動和不平衡發展的鐵則；一方面也就顯示了德國統治者運用「人爲的」政治力量，對於產業組織強化的成效。但這裏我們還得明白，德國企業組合之所以未採取脫拉斯（Trust）而普遍的採取卡特爾形態，實受其社會經濟基礎所規定，因爲它到底是後起者，儘管拚命的用力衝了上來，但仍然做不到英國那樣的結實，這是由於它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是像英國那樣由資本主義內在法則按序發展起來的；而是由於上層人爲的政治促使力所使然，所以經濟上的技術條件，還是趕不上英國，故不能一躍地就採施獨占企業最高形態的脫拉斯組織。同時，落後的生產單位（如生產規模較小之企業與手工業等），在德國整個社會經濟構成中，仍佔極大的比重，（一九〇七年德國雇用一人至五人的企業爲三、一三四、一九八。雇用六人至五十人的企業爲二六七、四一〇，雇用五十人以上的爲三二、〇〇七。——參見章植等合譯Flugel等合著之近代歐洲經濟史三一頁）。這種規模較小之生產單位，如果聽任各企業自由競爭的併吞，在這種併吞過程中，不僅要引起它們生產行程的隔斷；而且會致某些生產因素脫出生產行程而閒置下來。還在爭取時間的對外突破的競賽場合下，是極不合算的。爲避免這種浪費與損耗，充實對外競爭力量，需要國家政治力量予以干涉與調整，限制各企業間的自由競爭，而強迫其一律加入生產組合同盟，卡特爾就是最適合這種要求的企業組合形態。代表德國金融資產階級這種要求的史班全體主義經濟思想，就是在這種歷史社會條件下孕育的，他那理想中的梯級職團聯結式的社會經濟組織，正反映出當時德國金融資產階級要求內部緊密團結，集中力量一致對外的典型意識。

由於產業組織強化與通過政治力量的調整，雖然把內部的自由競爭緩衝了；但却大大的強化突破封鎖的實力，尤其是軍事工業的膨脹，終把德意志帝國加速度的推進戰場。一九一四年夏天塞爾維亞的槍聲，便把威廉二世久經準備的「武裝突破」冒險劇，正式揭開了幕，德國金融資產階級，總算實現了「武裝突破」的初步願望。但四年大戰的結果，在凡爾賽和約的懲下，德國金

融資階級的幻夢，終而被粉碎了。幸得新太陽的「山姆揆」爲着債務的清理和減緩經濟恐慌的瀰漫，施用道威斯計劃與楊格計劃這兩具還魂床，才把德國的金融資產階級從暈死中救醒過來。但這種救治，並不是華爾街的巨頭們樂善好施，而是以索取五十萬萬金馬克（每年）爲代價條件的。因爲協約國清償債務，是以德國賠款爲前提，要德國每年負擔這筆巨額賠款有來源，首得恢復德國社會的生產秩序，道威斯計劃就是在這種要求下產生的，賠款的直接負擔者雖然是德國的生產大眾，而不是德國的金融資本家；但在維護德國社會本質不澈底變更的前提下，讓德國金融資產階級蘇醒過來是需要的，同時在防止歐洲大陸「赤色運動」的擴展，這種措施，更是不可少的。

自道威斯計劃執行以後，彈死了的德國社會經濟，竟逐漸活潑起來了，但這種「活潑」，是寄存在產業「合理化」的基礎上，因爲凡爾賽和約不僅失去了廣大的人口土地和重要的資源地；而且再負上了賠款的重担。要打開這深重的「經濟國難」，祇有採施產業「合理化」，才能把整理通貨這種人爲的以及自然的保護上脫落下來的生產因素，有效的再引導進生產行程，才能強化勞動，擠出更多的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利潤，以充賠款和國內寄生階層的生活源泉。但前面我們已指出，德國在戰前小規模經營的生產單位，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中，是佔着極大的比重，經過大戰的破壞，這種小生產單位，在大企業潰解下更增多了。據一九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全部工業經營大約有二百六十萬個之中，沒有僱傭勞動者的經營的佔全體中五成四分，連只僱傭五人以下勞動者也包括在內，它的數量實在就超過了全體的八成七分，僱傭五十人以及五十人以上勞動者的經營，不過祇佔全體的三分之一七厘七毫〇了，這樣小規模經營的大量存在，要打都「經濟國難」，提高生產力，充實全國經濟力量，自然迫切的要求排除各企業間的相互競爭，要求各企業迅速的卡特爾化，就在這種情境下，充當德國金融資產階級喇叭的「全體主義」經濟學說，又抬頭了。因爲史班這種學說，不僅提供了德國金融資產階級推行產業「合理化」的「理論」根據口號，而且可以蒙蔽由「合理化」強化勞動所提高的階級實相。這自然是德國金融資產階級迫切需要的那末一套，利用來麻痺生產大眾的意識，緩和勞資間的衝突，低下勞工運動的高潮。史班的學說就是在這樣的現實社會背景出了風頭。同時，這種浪漫的學說，對於處在坎坷時代的德國人民，尤其是對一般布爾喬亞狂熱的愛國青年，更富有煽惑力。它在戰地德國之所以獲得廣大青年學生的熱烈擁護，甚至被尊爲德國經濟學界的「泰斗」，原因也就在此，希特勒上台以後納粹份子把它奉爲圭臬，也就是史班這套說教可以鞏固納粹領袖制，強化德國金融資產階級的產業統制，以便再來一次「武裝突破」。

從上面簡略的探討，我們已不難明白，史班這種學說也和其他任何一種思想或學說一樣，是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下，代表特定社會階層現實利益要求的產物。這點，在後面進而分析它的體系內容時，是更易清楚的。

二、構成史班學說體系出發點——全體觀的透視

所謂「全體主義」是史班用來對抗「個體主義」的一個對稱名詞，也就是史班藉以自豪的一個「寶貝」，據他自己的自供，他是繼承亞丹米勒（Adam Müller）的經濟浪漫主義，而自己又是米勒學說體系的完成者。一般以爲他把米勒譽爲「近代第一人」，是對米勒佩服得五體投地，其實他這種肉麻的贊譽，完全是用同光反照的手法在把自己鍍金，因爲他批評米勒「其思想猶未明白曉暢爲有系統之敘述，以宣示於天下，就實際應用言之，其著作多雜亂無章」，直到他手裏才